

政治

中俄政治发展道路比较分析

庞大鹏

【内容提要】中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互为影响的独特性。作为政治发展道路观念与原则体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有别于一般双边关系的特有因素。在崛起背景下中俄两国领导人提倡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互鉴，表明两国精英阶层认为双方发展道路的内核趋向一致。就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威资源的关系而言，中俄均强调国家控制能力的重要性，但权力结构的政治设计与运作机制有原则性区别。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中俄面临的挑战相似，都需要妥善处理权力和作用，协调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关系，但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问题有所差异。

【关键词】中俄关系 发展道路 比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3-0044-0009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政治发展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正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俄罗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向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转轨的政治发展进程。通过艰辛探索，俄罗斯同样走上了一条颇具俄罗斯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通过对中俄两国政治发展道路异同点的比较分析，可加深双方对各自发展道路的理解，从而增进中俄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一、中俄政治发展道路 互为影响的独特性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没有一个

国家能够像苏联那样，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国发展道路以及外交思想的变化也对苏联（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产生了难以回避的重大影响。可以说，中俄（苏）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大国双边关系，而中俄政治发展道路也具有互为影响的独特性。

其一，就历史经验而言，作为政治发展道路观念与原则体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有别于一般双边关系的特有因素。

苏联时期，决定中苏关系走向的本质因素是国家利益，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是政治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或分歧。中苏关系由亲密走向分裂就源于中苏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不同。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导致两国国

【作者简介】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①。苏联解体后,虽然双方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在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背后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动机和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美苏冷战对抗的形势下,新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余地有限。中国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出发,决定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一边倒”政策使新中国在经济上得到苏联的援助,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朝鲜停战开始,由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坚持干涉中国内政,毛泽东重新强化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提出有限和平共处思想,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发生转向。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末,中国逐步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确定了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简单地概括为“两条线”。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间关于国际战略的分歧、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争论和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使得中苏两国从战略盟友发展到兵戎相见。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和中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战略转向反帝、反修的“两条线”战略。此间,中国为了更有力地实施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又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欧洲、北美、大洋洲和日本。外交战略是大力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依靠第一中间地带的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的国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政治的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收缩性的全球战略调整。苏联趁机加紧扩张军备,美苏冷战呈现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提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以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总战略取代了“两条线”战略,即一条按照大致的纬度线联结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大片”),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力下降,美国内

外处境有所改善。中国成为影响世界战略力量平衡的一支重要力量。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苏关系开始改善。从1979年开始走出对抗到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经历了10年过渡时期:1979年10月中苏关系开始第一轮谈判,两国关系发生转折;1982年重新开始国家关系谈判;1987年恢复边界谈判;198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级化方向发展,国际环境表现出不同于冷战时代的新特点。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应对方针,使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灵活地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实施“全方位”的外交战略: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互不对抗为前提,以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为要求,以接触与对话为形式,以协商与合作为目的,切实发展中国与其他一切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双边外交关系。1996年4月24日,俄罗斯时任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两大民族决心世代友好下去,加强相互信任,充实合作内容。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纵览全局,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理论。“和谐世界”的思想是对我国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国外交思想的新突破。建设和谐世界的关键是建设和谐大国关系。由于中国自身的地理位置,要大力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和谐共处,在共同利益问题上进行充分合作,努力建设和谐周边关系。其中,建设和谐的中俄关系更是重中之重。也正是由于中俄坦诚相待,双方最终摆脱了结盟对抗时期留下的阴影。中俄建立了以国

^① 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家利益为核心的平等互利的新型国家关系，边界问题得到解决，排除了可能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最后障碍。

其二，就现实情况而言，在崛起背景下中俄两国领导人提倡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互鉴，这实际上表明两国精英阶层认为双方发展道路的内核趋向一致。

欧盟的实践说明，当区域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以后一定要转向国内社会经济进程的发展合作。中俄合作中仍存在的很多制约因素牵涉到各自国内的经济体制和结构问题，许多问题必须通过各自国内的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可见，在发展经验互鉴的同时要求双方充分了解并理解各自国内的发展战略，从宏观上把握两国合作的总体脉络。

目前，俄罗斯的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和中国的科学发展观都致力于解决各自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俄罗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主权民主”思想与中国的“和谐世界”理论也都着眼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消减西方民主压力的问题。这种发展理念与战略部署的相似性必将成为中俄关系良性互动的基础。

发展道路的经验互鉴要求转变思维，倡导共同发展。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所体现出来的治国理念表明，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主要战略任务是致力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这个战略重心和发展道路的确定，对于同样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和谐世界理论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积极因素。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使得中俄关系有可能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着眼点深化为共同的合作双赢，以求共谋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主权民主”思想认为，俄罗斯的发展必须考虑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这同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是一致的。和平、独立和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任务和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寓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之中。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强调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与传统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相比有了一个新的内涵，即把不与大国结盟或建立军事关系作为独立自主的重要内容。改变了从70年代开始执行的

“一条线”战略，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总之，在发展道路的根本问题上，中俄两国有了共识，这对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加强相互信任，夯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价值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中国反对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但是，也应该承认，意识形态方面共同语言增多，有利于相互沟通和理解，增加亲近感，最终有利于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道路内核的趋向一致也成为经验互鉴的理念基础。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是军事同盟关系以外最高层次的双边合作关系，今后中俄关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充实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在下一个十年进一步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中俄关系不是普通的双边关系，而是两个相邻的同时又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要区分战略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而且中俄关系既然是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双边关系，那就是在中俄双方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因此，中俄关系就必须继续发展，而且要致力于共同发展。发展道路内核相互趋近的背景为这种共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双方能够不断促进世界多元化发展，并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致力于解决各自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消减西方民主压力等问题上继续良性互动。因此，中俄关系可以也应当建立在寻求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战略协作基础上，这样的双边关系基础将确保中俄关系拥有一个新的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中俄政治发展道路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根本上受到本国文化与文明的内在制约。中国与俄罗斯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中俄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发展道路。差异性客观存在的，但这不代表差异性绝对的。差异性与相似性甚至共同性是互为依存的。这与世界政治发展的主题密切相关。20世纪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现代化展开。在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民族国家不可能

通过闭关自守实现崛起。在接受和吸纳先进文化的同时,文化的融合与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中俄两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经历了同主导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融合。这种近似的文化融合必然导致两国发展道路的某种相似性。当然,在同外来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并顺势将本民族文化推向更高层次发展也是中俄双方面临的共同问题。总之,正是由于这种现代化之路的背景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中俄两国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差异性。而且,相似性与差异性相辅相生,互为依存。那么,研究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视角是什么?众所周知,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力,并围绕个人、政府、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权力的来源、使用与监督,从而维持社会的秩序和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由此而言,研究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威资源的关系以及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两大中心问题,这两大问题实际上也就构成了对控制权力进行内在机理和外在影响两个层面分析的框架。较之其他策略性问题的讨论,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这里我们也从这两个方面论述中俄政治发展道路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一)就国家权力结构与权威资源的关系而言,中俄均强调国家控制能力的重要性,但权力结构的政治设计与运作机制有原则性区别

1. 相似性比较

中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的一个理论基础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责任重大,它不仅具有市场经济国家一般职能,还应具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职能。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国情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是中央政府主导型。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①。对于俄罗斯而言,叶利钦曾明确指出,强大国家是继续改革、克服危机、搞好经济结构改革、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创造条件的基础^②。普京也在其思想宣言——《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表示强有力的国家是经济发展的保障。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最可靠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过程中也会出现间断现象。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在现代化转

型的历史进程中,强调国家控制能力的重要性是中俄政治发展道路的相似之处。

也正是基于这种相似性,中俄均坚持一种新权威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发展道路。完全封闭性运作的国家权力结构在中俄两国已不复存在,须知,这种以旧权威主义为特征的政治发展道路曾经让中俄两国备受挫折。当前中俄两国在政治运作中均已抛弃命令式计划和管理体系,使国家政权体系转而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以保持二者的利益平衡,确立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规模,为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和机制。

2. 差异性比较

首先,在具有上述相似性的同时,中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设置上存在原则性的区别。

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许多西方学者所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③。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是在国家政权软弱无力的背景下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罗斯转轨的内在要求,是要对俄罗斯政治结构进行重建,确立宪政制度,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立宪的选择。“宪政的主题是让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活动受到某种超越性高阶规范的约束,避免‘阶级立法’或者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使自然法以及基本人权的正义理念能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④俄罗斯确立了三权分立宪政制度的方向,至少在政权形式的设计上追求有限政府、权力分立、保留私人领域与个人权利以及独立司法机构。

其次,不仅如此,在这种权力结构原则性区别的前提下,中俄权力结构的运作机制也存在本质不同。

^①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② 庞大鹏:《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转型——以“国家性”观念为视角》,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2期。

^③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④ 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分析中国权力结构的运作机制的关键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一概念，而解读俄罗斯权力结构运作机制的核心在于充分理解拥有强大执行权力机构的总统制。

“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一概念是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理论范畴中衍生出来的。政治体制作为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实施形式，包括国家权力结构、政党和社会团队、行政、司法、监督、干部人事及意识形态管理等许多体制范畴。在政治体制诸范畴中，关于国家社会政治事务的领导原则、领导方式和制度、领导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总和，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的基本格局是在国家事务中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与这种一元化领导原则相应的领导方式和具体制度包括党委制和党组制^①、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党管干部的制度、分口领导方式和双重领导方式、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度^②。

俄罗斯拥有强大执行权力机构的总统制。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出现于1991年，当时俄罗斯联邦还是苏联版图内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由全民投票选举产生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在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上得到了确认。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任期五年。1993年十月事件后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俄罗斯总统在执行权力机关的组织和运作方面拥有最为广泛的权限。总统直属机构体系包含四个分支体系：总统直属会议咨询性机构体系、总统全权代表体系、总统办事机构体系、总统直属国家机关体系。这在机构设置和具体领导方式上充分保证了总统所拥有的广泛权限。

由此可见，在权力结构的运作方式上中俄两国存在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拥有在历史中形成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一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运作方式而言，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③。俄罗斯宪政体制的关键在于总统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普京表示，如果总统软弱，就没有强大的俄罗斯。俄罗斯在一个中期历史前景内，需要一个强大的总统制政权。尤其是在稳定、完善的多党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俄罗斯除了强大

的总统制政权，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民主形式^④。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执行权力机关，这一政体应当维系下去，俄罗斯联邦才能得以保全^⑤。

（二）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中俄面临的挑战相似，都需要妥善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协调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关系，但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问题有所差异

1. 相似性比较

如果从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审视一个强大国家的内在要求，它必然要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并且要通过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纠错机制来取得人民的支持与监督。在中俄这样的威权政治传统源远流长的转型国家，如何更好地适应权力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尤其引人关注。例如，如何处理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最集中地反映了这一问题。众所周知，如何实现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的有效分离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由此衍生出来的寡头政治问题一度成为俄罗斯政治稳定中的毒瘤。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识之士一直呼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这都深刻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如何妥善处理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关系及政府的责任问题。

2. 差异性比较

与此同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基于历史背景和现实具体问题的不同，中俄两国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有较大差别。

首先，就历史背景而言，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但从清朝末年开

①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决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体制内领导。

② 庞松、韩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与改革展望》，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③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④ Встреча с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14 сентября 2007г, 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7/09/14/2105_type63376type63381type82634_144011.shtml

⑤ Беседа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С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24 января 2008г, http://www.medvedev2008.ru/live_press_01_24_smi.htm

社会基础的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分裂与解体。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应对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通过重建政治整合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且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就此而言，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转型期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①。

俄罗斯也面临政治发展与公民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題。民主化如果不以法治为基础将会导致民主进程本身的私有化，并阻碍国家和社会发展。应该允许俄罗斯在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之前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公民社会^②。普京早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指出：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无法有效地解决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日常生活的品质直接取决于社会政治体系的质量。在这方面俄罗斯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历史传统表明，在俄罗斯社会空间引入市民社会的机构和设置，通常会导致负面社会效果。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社会系统，其基础是政权效应，而不是像美国和西欧国家那样是所有权效应。与西方相比，俄罗斯的所有权与政权的关系是颠倒的。政权的出现早于土地所有权，而所有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仅作为政权的功能而存在。所有权的内容及其实现方式取决于政权关系结构^③。一方面，公民社会是民主与法治的前提因素和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的影响，又难于协调公民社会的发展，这种内生性的结构矛盾是影响俄罗斯政治转轨的核心问题。

其次，就现实问题而言，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潜力参与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家在调控微观和宏观经济以及调节社会问题时的职能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

过程不能在执政者确定的某个阶段一成不变，这个阶段需要政权自身的变化，首先需要在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主权范围的一些领域进行不同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本身的需要，也是在市场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推动了改革运动。现代化意味着完整和全面的发展进程，但也是一个分阶段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国也不能避免在社会优化的同时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改革方针的制定者曾竭力避免发生的。在各社会阶层和各社会团体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都出现了严重分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由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中国发展前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如果不能以合法的策略消除这种严重的矛盾，它会破坏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形成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培育能认识自身利益并且通过政治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民主制度的现实主体。需要进一步建立民主制度，满足市场和不同集团的需要并实现他们的利益。以往在同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里，严格地说社会不需要这样的民主机制。社会结构趋于复杂以及新的社会矛盾的出现和深化都清楚地表明缺少方法协调利益纷争，需要新的方法平衡社会政策中的问题。这些方法的滞后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甚至使发展停滞。这样就不难理解执政党在理论与意识形态上的一些提法了：如“三个代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五大协调”、“和谐社会”。“协调”的观念逐渐代替以往“团结”的提法，后者往往不承认、抹杀甚至掩盖社会中的利益差别。“协调”的理念成为发展新思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拒绝平均主义、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中国协调各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利益绝不是为了采取类似西方的国家和社会管理模式，例如议会民主和以多党制为标志的政治多元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盲目追随西方模式的政治民主化绝不会使这些国家摆脱社会不平等、经济危机和腐败。中国如果走这条道路将会引起更大的危害甚至引起国家分裂^④。

① 孙立平：《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载《瞭望周刊》2009年第35期。

② Виктор Полтерович, Демократия без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5 декабря 2006 года.

③ [俄]戈连科娃主编：《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分层》，宋竹音、王育民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④ [俄]库泽科、季塔连科：《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2期。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关系不合理两个方面。单就再分配领域而言,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①。中国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的意愿和能力问题。如果政府对再分配问题不重视,那么再分配制度是不可能完善的。而一个政府如果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却缺乏必要的财政汲取能力,它也难以建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只有当一个政府进行再分配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强的时候,再分配问题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②。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也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而这种资源再分配结构是否公平合理就成为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社会资源分配形成的财富结构始终没有被俄罗斯民众认可,俄罗斯的垄断利益集团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此种共同利益的倾向。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限制分利集团。寡头阶层本质上就属于分利集团。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尽管整个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增进利益集团成员的福利,但更有效更普遍的做法却是尽可能为集团成员从社会生产总额中争得更大份额,这样分利集团就可能为求更大份额而不顾社会总收益的下降,久而久之,已经形成的分利集团形成垄断地位,保守僵化,决策迟缓,对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变革一律排斥,这不仅阻碍了社会进步,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利益。这就对矢志于提出建设公民社会、形成稳定中产阶级的普京形成巨大挑战,普京唯有摆脱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阶层的控制,打破该社会阶层通过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弊端。2003年10月发生的“尤科斯”事件的深刻内涵由此不难理解。在对资源分配结构重新构建以后,普京基本解决了权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关系的难题。但是,由于普京时期与叶利钦时期依靠的政治力量大有不同,这又恰恰引发了普京时期政治稳定的新问题。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官僚体制效率低下,官员腐败问题难以解决,另一方面,这种中央集权式国家统制政策有可能出现苏联时期的低效性问题,即使这一措施能够增加国家税收,但能否

有益于国家的整体发展还有待观察。

总之,以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利益关系为主线观察社会结构,揭示社会政治阶层行为与制度变迁互动的关系,进而探讨社会阶层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冲突,是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两点思考

(一)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如果要论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对中国崛起的影响,需要区分政治哲学和政治运作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及其与中国崛起的互动关系。就政治哲学层面而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它概括了中国现实政治的本质、目的和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对现实的政治进行理性的指引。就政治运作而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不仅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术语,而且还是蕴涵在中国发展模式整体理念之中的政治实践。对于这种实践的总结,就不能不提到“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一书最初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其作者雷默认为,中国正在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中如何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雷默提出了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则,分析了“北京共识”能够吸引他国的主要原因。在全书最后一部分雷默指出,与中国打交道的秘诀就是抓住它的薄弱之处,而不是它的长处^③。“北京共识”显然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而言的,本质上也是海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概括。“北京共识”激发了人们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不过,由于“北京共识”这个概念重在探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的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并且给人的印象似乎要和“华盛顿共识”一样成为一套普遍原则,有违中

^① 苏海南:《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载《理论前沿》2009年第15期。

^②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③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国外交原则的初衷，所以并没有被中国学者广泛接受。中国学者倾向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等概念。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由于“北京共识”回避了影响中国发展的现实障碍，造成了海内外并没有对这种共识达成一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的提法更为准确、稳妥和灵活。中国模式成功的基础性工作“北京共识”的解释框架所无法包容的^①。

这就引发人们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思考。如果说在政治哲学层面我们充分肯定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崛起的积极意义，那么中国的这条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否可以被复制，能否具有普遍性呢？

“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做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道路。中国的国情特殊，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效仿的。而且，“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虽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但中国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对“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中国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也指出，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国模式”，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走中国式的道路^③。

（二）影响俄罗斯崛起的要素

1. 地理环境要素

地理环境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并影响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俄罗斯文化的形成以及俄罗斯国家结构形式的完善与此密切相关。一方面，领土跨越欧亚两大洲的地理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文化特征，并对国家治理的政策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不论是以扩张求安全还是兼顾东西方的政策原则都是这种影响的体现。“对俄

罗斯来说，同西方欧洲伙伴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俄罗斯已保持着这种关系。俄罗斯仅同欧盟国家的贸易额就达到每年2500亿美元。但与东方的关系对俄罗斯也非常重要，俄罗斯将同东方伙伴发展经济、政治及其他关系，俄罗斯重视新兴经济地区。因此，俄罗斯将在各个方位开展工作。”^④另一方面，地理环境因素也对俄罗斯的国家结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适合以联邦制而不是单一制的国家机构形式进行治理。俄罗斯的联邦制度只能继续完善。而完善联邦制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地区无政府状态与过度集权这两种极端做法之间寻求适宜的制度安排。联邦制度的精髓在于纵向分权，但其并不是排斥中央集权。然而，过度的中央集权同过度的地方自治同样有害。处理好分权与集权的关系才是联邦制度的应有之义。俄罗斯联邦制度的调整完善远未达到最佳状态。建立一种中央同地方互相协作、顾及双方利益的有效机制是俄罗斯联邦制度长期的历史任务。

2. 经济要素

经济要素构成国家治理最基本的要素。这在作为国家治理的内在动力之一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分析。经济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技术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各种资源的流向和政策的出台。

3. 政治要素

政治体制的开放和灵活是俄罗斯国家治理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政治体制具有更加复杂的内部结构，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灵活多变、透明而又多维的社会结构，满足自由、富足、富有批判精神和自信的人民的政治文化需求，也就是说才能实现国家、社会与民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可见，政治改革取得成效是俄罗斯国家治理良性发展的主要前提条件。合法和设定合理期限的政权更替机制是牢固而有效的国家体制的基础。而且，在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下，精英的很大精力被耗

^① 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② 俞可平：《“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5958>

^③ 王缉思：《“中国道路”任重而道远》，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5日。

^④ Интервью датской радиовещательной корпорации, 26 апреля 2010г,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7559>

散在把持权力或在集团内部重新分配权力上。整个国家机器都被用来自保而不是发展国家。这甚至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文明发展^①。政治要素还包括国民心态的现代化问题。如何让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感召力和吸引力,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问题。致力于实现新政治战略的俄罗斯必然需要国民心态的现代化。

4. 国际关系要素

在国际关系要素的影响下,如何处理好认识、定位与原则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对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俄罗斯的内政外交也因此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外关系和事务与国家内部事务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它要服从于国内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国内事务与之配合。因此,从战略的层面分析形势,从战略的层面规划未来,从战略的层面联结内政外交,从战略的层面指导一切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这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所在。

总之,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

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②。需要指出的是,涉及中俄崛起背景下政治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学术点极其丰富,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试图解析核心概念,对比核心问题,关注政治发展中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的对比分析。对于中俄政治发展道路的全面比较分析显然需要更细致和更严谨的论述。从本文对中俄政治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不同国情的国家不会有相同道路,但都会选择独立自主道路。中俄双方正视并充分理解这一点。早在 2005 年 7 月通过的《中俄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中俄双方就郑重声明: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是中俄双方的重要共识。应在相互尊重和包容中开展文明对话与经验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求共同进步^③。

(责任编辑 刘阳)

① Семен Новопрудский, Двухместный тр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16 апреля 2010г, <http://www.gazeta.ru/column/novoprudsky/3352367.shtml>

②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2 日。

③ 《中俄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2005year/hjtsco8/t201988.ht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no-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PANG Dapeng

Abstract: The Sino-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has a mutual influence uniqueness. The ideology reflected by th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their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has been a special factor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ir ti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rise, the leaders of the two nations advocate mutually learning of experience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This shows that the elites of the two countries believe that the core of their development roads tends to be the same.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both China and Russia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state control ability. But the mechanisms of their political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have a principled distinction.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China and Russia meet with the same challenges, both need to duly handle the role of power and social factors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efficiency, justice and stability, but the two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i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reality for that issue.

Key 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development road; comparison